

Martin
Heidegger

[美] 乔治·斯坦纳 著

海德格尔 (修订版)

Martin Heidegger

李 河 刘 继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美] 乔治·斯坦纳 著

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修订版)

李 河 刘 继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德格尔/(美)斯坦纳著;李河、刘继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11
书名原文: Martin Heidegger
ISBN 978-7-308-10788-4

I. ①海… II. ①斯… ②李… ③刘… III. ①海德格尔, M. (1889~1976) — 语言哲学 — 研究 IV. ①B516.54②H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3990号

海德格尔

[美] 斯坦纳 著 李河 刘继 译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张兴文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47千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0788-4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目录

001	新版序言
041	前言
063	第一章 若干基本概念
127	第二章 《存在与时间》
189	第三章 海德格尔的在场
227	海德格尔年表
229	译后记
231	人名索引

新版序言

1991 年：再论海德格尔

—

德国在 1918 年遭受的精神危机远比在 1945 年深刻得多。在 1945 年，物质的毁灭和伴随第三帝国崩溃而陆续曝光的反人类暴行，使德国人的想像力陷于休克状态。为苟活而寻找生活必需品的努力耗尽了战争中残留下来的最后一点智力和心理资源。造成那个病态而分裂的德国的条件前所未见，希特勒的残暴又是如此闻所未闻，人们很难对此作出系统的哲学批判或评估。相比之下，1918 年的情形虽然也是灾难性的，但那时的德国不仅物质和历史环境的稳定性得到了保持（譬如德国领土几乎保持完整），而且很重视对欧洲文化蕴涵的自我毁灭因素和持续性因素的反省和感受。国家的骨架未伤，纯学术和人文传统如故。因此，旨在对混乱状态有所言说的形而上学－诗性话语（metaphysical-poetic discourse）便应运而生——所有这些都是 1945 年后的德国所不具备的。

在这样的话语条件下，一批在西方思想和感受史中极为鲜见的作

品纷纷问世。从 1918 年到 1927 年，短短 9 年期间，德语世界出现了不下 6 本角度新异、风格极端的著作。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的《乌托邦精神》（*Geist der Utopie*）^[1] 第一版初版于 1918 年。同年问世的还有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2]（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第一卷。1919 年，卡尔·巴特（Karl Barth）对圣保罗《罗马书》进行解读的《罗马书释义》（*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3] 首版面世。接下来的 1921 年，弗朗茨·罗森茨威格（Franz Rosenzweig）推出了《救赎之星》（*Stern der Erlösung*）^[4]。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于 1927 年出版。然而这里最困难的问题是，是否应当或应以何种方式把第六本书纳入上述书目阵容？这就是《我的奋斗》，它的两卷本出版于 1925 年到 1927 年。

这些著作大体上有什么共性呢？它们都是些大部头作品。这不是偶然的。尽管黑格尔时代已然过去，但这些作品一律表现出追求

[1] 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生于德国犹太人家庭，青年时期受旧约神秘主义思想尤其是“弥赛亚意识”影响。1922 年第一部作品《论“尚未”范畴》。1918 年完成表现主义风格的著作《乌托邦精神》。纳粹上台后流亡美国。在那里完成《希望的原理》。1949 年前往东德。——译注

[2]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德国历史哲学家。1904 年在哈雷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在中学教书。后离职从事私人写作。1918 年在慕尼黑贫民窟完成《西方的没落》，对汉语知识界产生了几代人的影响。一生避居在德国学术圈之外。——译注

[3] 卡尔·巴特（Karl Barth，1886—1968），瑞上新教神学家，20 世纪最重要的宗教思想家。他摒弃自由主义神学，强调《圣经》是上帝的话，人类需仰赖上帝的恩典。曾在德国执教到 1935 年，因反对纳粹遭到驱逐。《罗马书》是圣保罗的作品。卡尔·巴特的《罗马书释义》被公认为 20 世纪神学研究的经典。——译注

[4] 弗兰茨·罗森茨威格（Franz Rosenzweig，1886—1929），德国犹太神学家和哲学家，先后在哥廷根、慕尼黑和弗莱堡等地大学学习，后转向犹太哲学。——译注

总体性的迫切愿望。虽然当时的人至多尚处于某一特殊的历史或哲学秩序的起点，但这些作品却试图为所有可行的精神洞见提供整全性的概括。这些作者似乎要用既急促又冗长的方式在德国文化和帝国霸权崩坍的地方营造起宽敞的语词大厦。这是一些充满先知口吻甚至乌托邦气息的文本。然而，布洛赫心目中的希望的乌托邦（the utopia of promise^[1]）在斯宾格勒的历史重负下就像一缕落日的余晖，又宛如一曲古老的离歌（*nunc dimittis*）^[2]。它正像一切名副其实的预言一样，其实不过是对失落的往日理想的追忆和缅怀。1918年的氛围就是这样，它驱迫人们或默许人们沉浸在对往昔文明、对曾经有过的文化安定、对1914年前的美好世界的多少有些美化的回忆之中。但这种回忆在1933年到1945年间被割断了。

从专业角度说，这些著作都具有末世启示论的色彩。它们高度关注“末世之事”（the last things）。同样地，这种末世启示可以是有益的。例如，罗森茨威格指出了一条通向救赎的道路；恩斯特·布洛赫 ix 为世俗世界描绘了一幅充满救世色彩的解放蓝图。不过，这种末世启示预言也可能是对人类劫难的暗示。在这一方面，巴特提出，在上帝与人、神性的无限与人类直觉的固有局限之间不存在任何可通约

[1] Promise 的直译是许诺，但它包含着希望和应许的意思。——译注

[2] *Nunc dimittis* 是拉丁文，多译为“西缅之颂”。故事来自《圣经·路加福音》第2章，犹太人西缅（Simon）得到圣灵启示，死前能见到拯救者降生。耶稣诞生后，西缅为他唱起颂歌，中有：“主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即西缅）安然去世。因为我已亲眼见到你的救恩。”这个表达永别主题的颂歌后来成为巴赫、拉赫玛尼诺夫的重要创作主题。此处译为“离歌”。——译注

性，这些看法是相当玄虚晦暗的。它表明，人们迫切地需要希望，但希望就其本质而言却是虚幻的。我们从《我的奋斗》中看到的正是这种可怕的、末世启示论的图景。这些产生于德意志废墟上的作品既是为那些注定走向没落的男男女女们写的（如同斯宾格勒所说），又是写给那些注定要经历脱胎换骨改造——即从过去死亡的灰烬中痛苦再生——的男人和女人們的。在这方面可以与之匹敌的利维坦式作品只有奥地利作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的《人性的末日》（*The Last Days of Humanity*）^[1]。无论怎样，从过去死亡的灰烬中再生是布洛赫、罗森茨威格等人的作品传递的信息，在某种永恒的不合时宜的意义上，这也是巴特的看法。同时，它也是希特勒对 Volk（“人民”）的允诺。

总之，鸿篇巨制的规模，先知般的口吻，求助于末世想像的文字，这一切聚合成一种特殊的暴力。这确实是些充满暴力意味的著作。在神学文献中，有谁能像卡尔·巴特那样说出如此暴力的格言：“上帝对人世说出他那亘古不变的‘不’。”在罗森茨威格那里，暴力分明是一种激越的情感：上帝的直接性之光以不可阻挡的方式打破了人类的意识。恩斯特·布洛赫歌唱革命，祈祷革命，呼吁推翻人的内心和社会中的一切现存秩序。他在《乌托邦精神》甚至热情地为托马

[1] 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 1874—1936），奥地利著名文学家，善于表现理想幻灭的主题。1915年到1917年写作宏大诗剧《人性的末日》，全剧共5场209幕。该剧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为背景，表现人类的悲剧性本质。——译注

斯·闵采尔 (Thomas Münzer)^[1]、为他领导的 16 世纪德国农民的“千年太平国”宗教起义而欢呼。同样，在斯宾格勒的巨著《西方的没落》中，人们也常会感受到这种巴洛克式的暴力，这种在灾难中表现出的修辞学意义上的满足感——他正是带着这种情感谈论着所谓“星辰的陨落” (the falling of stars)。至于希特勒雄辩演讲中所充斥的反人性的喧嚣，这里就没必要一一列举了。

这种暴力无可避免地变成了一种流行风格。表现主义便是这风格的集中体现——当然，对表现主义的界定往往失之宽泛。上述作品与表现主义文学、艺术和音乐中蕴含的美学和修辞学取向存在着明显的相互影响。在波墨 (Jakob Böhme)^[2]、克尔凯郭尔^[3] 和尼采^[4] 那里，我们已经听到这种思潮的先声。它贯穿于整个表现主义，亦如贯穿于上述六个作品一样。那里弥漫着一种末世论的极端情绪。不过，我试图从巴特、海德格尔或布洛赫作品揭示的是一种特殊的东西，即否定意识。这种意识渗透在《罗马书释义》的语法和思想中，体现在罗森茨威格对世俗性的分析中，当然也充斥于《我的奋斗》的基于虚

[1] 托马斯·闵采尔 (Thomas Muntzer, 1490—1525)。德国宗教改革的激进派领袖，德意志农民战争领袖，主张经过暴动由下层民众在现实世界建立一个千年太平之国。1525 年 5 月战败被杀。——译注

[2] 雅各布·波墨 (Jakob Böhme, 1575—1624)，德国神秘主义和泛神论哲学家。主要著作有《曙光》和《伟大的神秘》。——译注

[3] 克尔凯郭尔 (Søren Aabye Kierkegaard, 1813—1855)，丹麦宗教哲学家，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对海德格尔产生很大影响。——译注

[4] 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德国思想家和文学家，近世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展开猛烈批判的第一人，著有《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看那个人》等一系列著作。——译注

无意识而采取的破除陈规的策略之中。不过，这不是黑格尔意义的否定，即那种蕴涵着积极辩证成果的观念。如今我们在海德格尔研究中经常会碰到如下核心概念，如“无”有（nothing）、“无的状态”（nothingness）、*nichten*——这是一个不可译的（德语）动词，即“使其无”（to nothing），所有这些概念构成了一个相似的集合。同样，巴特的上帝是个“关于世界之非是或无所是状态（the non-being 或 the being-nothing）的裁判者”。^[1]正是依据古典的或理性本体论中的神性的非此在性（not-thereness）的思想，罗森茨威格引申出了他的拯救方案。也正是为了反对这种否定性的无（*Nichtigkeit*），反对由于世界大战的疯狂而加诸历史和人类希望的否定性声音，恩斯特·布洛赫大力张扬一种具有压倒性力量的、旨在拯救生命的大写的“是”（Yes）。在这方面，他的抒情联想能力丝毫不逊色于詹姆斯·乔伊斯《尤里西斯》中的女主人公莫利·布鲁姆^[2]。

无或无的特性的观念在形而上学史和神秘思辨史中具有双重根

[1] 英语 nothing 或 nothingness 是对德语 nichts 或 Nichtigkeit 的翻译。德语词突出的是“无”或“不”这样的论断含义，所以本书作者认为对它们的最好翻译是 to nothing（动词不定式用法）。而英语中与这些词对应的单词多由两部分组成，即 no- 和 -thing。前缀代表“无”或“不”的论断含义，后者代表的是论断对象。因此，nothing 即“无”的分解性含义就是“无物”、“无有”，它等价于 non-being。为方便起见，本书译者把 nothing 译为“无”，把 nothingness 译为“无的状态或特性”。——译注

[2] 乔伊斯（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1882—1941）。爱尔兰 20 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尤利西斯》（1922）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这里提到的莫利·布鲁姆是《尤利西斯》书中的主人公利奥波德·布鲁姆的太太。小说对布鲁姆一家及爱尔兰都柏林的市民生活进行细致的刻画。乔伊斯逝世后，都柏林市民把每年 6 月 16 日定为“布鲁姆日”，以纪念乔伊斯和他的伟大作品。——译注

源。海德格尔的无观念直接导源于莱布尼茨那个著名提问：为什么存在的不是无（Why is there not nothing）^[1]？这个对再生（renascence）的召唤具有重要的语言学意义。语言必须实现自我更新。它必须清洗掉某个死亡的过去加在它身上的那种顽固残余。我们知道这种清洗的（*kathartic*）要求内在于马拉美以后的全部现代主义。我们知道无论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还是超现实主义，几乎没有哪个现代意义的美学宣言或学派不在它们的基本原则中声张要创新诗性的话语。霍夫曼斯塔耳就曾以挑剔而直截了当的口吻问道：在经历了1914年到1918年的诸多事件后，人们还怎么可能继续使用那些陈旧的、用滥的和充满虚情假意的语词（维特根斯坦对这个问题曾给予高度关注）？正是这种更新语言的尝试在我前面提到的那些著作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进程度。如果说斯宾格勒还显得有些老派（这或许是刻意模仿的结果——这个业余学者好像有意要用一种道学气的口吻来遮盖其大预言^[2]所固有的狂野特性，这不过是套用歌德《浮士德》模式的把戏），那么布洛赫、罗森茨威格那样的作家则是公开的新语言创造者（*neologist*）和传统语法颠覆者。巴特在其《罗马书释义》随后的修订本中弱化了他的私人语言风格中所带有的精心雕琢的陌生性，这种风格具体地展示了人的逻辑与真实上帝之间的鸿沟，这个上帝是“通过摒弃全部客

[1] 全句有时也表述为 Why is there something, rather than nothing？即为什么存在在那儿的总是某物而不是无。——译注

[2] 原文为 Pronouncements。这里指斯宾格勒的著作《西方的没落》。有人指责该书纯属“巫术”，继承了犹太先知的“预言传统”。——译注

观性而造成全部客观性危机的根源”。在希特勒的那种反逻各斯的语言中，尚有大量内容需要分析。总的说来，与所有其他语言相比，德国语言充斥着更多的故意和暴力意味。这或许是受到了达达派的深刻影响，这个艺术派别以绝望的方式呼唤着一种全新的人类语言，一种用于表达对时代的绝望和期望的语言。一次大战后的德国语言正是以这种方式寻求与过去的决裂。由于德语天生具有一种独特的灵活句法，具有一种可随意对单词进行拆解或将单词与词根组合起来的潜力，德国人便对其过去时代的旨在鼓动创新的特立独行者格外青睐，如爱克哈特大师（Master Eckhardt）^[1]、波墨、荷尔德林^[2]。此外，他们还特别关注类似的创新之作，如超现实主义作品和当时的电影。总之，罗森茨威格的《救赎之星》，布洛赫著述中那些充满弥赛亚气息的段落，巴特的解经学以及——最重要的——《存在与时间》这部作品，都是最具革命特点的言语行为（speech-acts）。

xii

惟有在这样的语言和情感环境中才可以理解海德格尔的方法。《存在与时间》是高度原创的产品。但它与那些具有末世启示录色彩的同时代著作显然声气相关。像它们一样，《存在与时间》试图超越现成的德国语言，通过极端的创造和向“被遗忘”源头的选择性回

[1] 爱克哈特大师（Meister Johannes Eckhart，约1260—1372），德国神秘主义哲学家和神学家。主张上帝与万物融合，人性是神性的体现。人与万物合一，也可以与上帝合一，是德国新教、浪漫派和现代存在主义的先驱。后人尊称他为爱克哈特大师（Meister）。——译注

[2] 荷尔德林（Friedrich H. Hölderlin，1770—1843），德国伟大的浪漫派诗人，写出了大量经典诗作，翻译索福克勒斯的古希腊悲剧。1798年起患精神分裂症，直至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译注

归来锻造一种新言语。卡尔·洛维特^[1]就曾指出《救赎之星》与《存在与时间》之间存在着一些修辞学和存在论意义上的相似之处，他或许是注意到这个现象的第一人。卡尔·巴特经常对语言和思想采取一种粗暴矛盾的修饰法，最著名的是其关于神圣性的遮蔽与启示的辩证法，而几乎同样的方法也出现在海德格尔的真理论述中。两部著作中都弥漫着强烈的存在主义气息，如人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向着生活的“被抛状态”（thrownness），还有同样强烈的启明观念（illumination），以及在现存在者“背后”的在场观念（the sense of presence “behind” the extant）。恩斯特·布洛赫在行文中喜欢使用意合法（*parataxis*）和回指复现（anaphoric reiteration）等修辞手段，这也是海德格尔的常用手法，他用这种方式将抽象的东西人格化，并将一些语法上抽象的或介词性的范畴当作名词一样来谈论。此外，如果把海德格尔对现代性造成的精神衰退和地球资源浪费的描述与斯宾格勒的“人的黄昏”（*Menschendämmerung*）的说法加以对比，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绝非巧合的一致。总之，海德格尔的语言固然与其哲学以及这种哲学所提出的独特问题密不可分，但我们同样必须把它看作从1918年的大变局到纳粹崛起期间的德国特有的现象。我们今天在尝试倾听和翻译这种语言时所遇到的许多困难都直接源于这种语言的不合时宜性。一个明

[1] 洛维特（Karl Löwith, 1897—1973），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学生。出生于犹太人家庭，本人皈依新教。纳粹上台后流亡于意大利和日本，1941年又从日本流亡到美国。曾在新学院执教。1952年回德国担任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马丁·海德格尔与欧洲虚无主义》。——译注

显的事实是，我们不可避免地要用自 40 年代和 50 年代形成的历史意识和话语意识来理解一个更早时代的言语世界。

xiii

伽达默尔^[1]称海德格尔是“语词天才”，这是公正的。海德格尔可以洞悉和把握“进入到语言的基石处”的一些重要词源学线索。这位《存在与时间》的作者，这位形而上学意义诸讲座和《论人本主义》一封信的作者，这位尼采、荷尔德林和谢林的评论者，像柏拉图和尼采一样，是一位具有超凡力量的文体家。他喜欢使用双关联想（punning），不过双关联想这个词实在不足以表达他对语音和语义中存在的那种回应、和谐和高度共鸣所具有的不可思议的接收能力。正是这种双关联想哺育出今天的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成为它们效法的对象。海德格尔在语言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亦如他在存在论、现象学认识论或美学（或许还有更多）上的地位。他留下的材料卷帙浩繁，最终可能多达 60 卷以上（我们至今编辑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然而，正是这种浩繁的作品与其文本的力量产生了某种自相矛盾。大量的作品有可能会遮蔽口语形态的语言在海德格尔严肃思想事业的学说或观念中具有的重要地位。

[1] 伽达默尔（H-G. Gadamer，1900—2002），德国哲学解释学大师。海德格尔 20 年代的学生。早年在马堡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并执教。1939 年转到莱比锡大学执教，并在战后被提名为该大学校长。由于该校位于东德，伽达默尔辗转逃往西德，先在法兰克福大学短暂任职，后于 1949 年在海德堡大学接替雅斯贝尔斯的教职。其重要代表作是 1960 年出版的《真理与方法》。——译注

洛维特、伽达默尔和阿伦特 (Hannah Arendt)^[1] 这些目击者曾不约而同地提到, 那些没有亲耳聆听海德格尔讲座或亲身参与他的讨论班的人, 对海德格尔的意图只能获得某种不完整的、甚至是扭曲的理解。正是 20 年代早期在马堡的那些先于《存在与时间》的讲座和讨论班, 给当时的同事和大学生们带来了醍醐灌顶般的震撼。阿伦特后来回忆时称她老师的言谈举止犹如一位“秘密的思想之王”。伽达默尔则用“大破大立”(Einbruch und Umbruch) 来形容他听海德格尔授课时的感受。现有的为数不多的老年海德格尔的讲话录音还依然保持着这种魅力。有批评者指出在其简单直率的提问背后有一种过于戏剧化的催眠味道。我们知道, 这个指控透着一重古老的光环。它与苏格拉底 xiv 的风格最接近。海德格尔认定, 苏格拉底是“最纯粹的”西方思想家, 而表现这种纯粹性的一个简单事实就是“他从不写作”。柏拉图在《斐多篇》和《第七封信》中指出, 在逻各斯的追求、哲学的探究与书写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冲突。文字扼杀精神。书写文本在面对即时回应的挑战时只是个哑巴。它不容许任何来自精神内部的生长和矫正。文本颠覆了记忆(即 *Erinnerung*, 这是海德格尔的重要术语) 特有的那种活力。在古希腊, 全身心投注于写作技艺的是那些智者、修辞学家和演说家。而真正的诗人必定是个口语化的吟诵者。

[1] 阿伦特 (Hannah Arendt, 1906—1975), 美籍德裔政治哲学家。生于德国犹太人家庭, 是海德格尔 20 年代的女弟子。获得博士学位后无法取得大学教职, 转而研究反犹问题, 受到迫害移居巴黎。1941 年从法国流亡美国, 在许多重要大学做访问学者或担任教职。其代表作是 1951 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根源》。——译注

真正的思想家和本来意义的教育者依赖于面对面的交谈，依赖于焦点清晰的动态的直接对话。这个过程将提问与回答、生动的表达与接受编织为一个有机整体。这种认为重要的哲学学说排斥书写的看法在西方传统中由来已久（在东方传统中亦复如此）。在这方面，维特根斯坦的活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明证据。他像海德格尔一样是个反学院气的学者，是个对“哲学职业”的传统和流行含义均大不以为然的嘲讽者。（我深信，虽然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这两位划时代的哲学—语言思想家表面看起来水火不容，但他们却具有某种深层次的关联，这给未来的研究和理解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

xv 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的大部分著述尚未出版，《存在与时间》一直没有完成，并且像海德格尔最初设想的那样保留着大量的片段话语形式。海德格尔文本中的追问语句以及同义反复性的表述大多出自其讲座、讨论班或日常对话中的记录。其中一篇虚构的对话据说是同日本学生进行的，就收录在海德格尔论语言本质的文集中。^[1]我注意到，海德格尔的文字对于一双阅读的眼睛（the reading eye）来说往往是暧昧难解的。但如果你依照某种音乐的逻辑对它们大声朗读，就像学生和听众们首次听到它们被朗读或被言说一样，你会感觉那些纸面上的呆板字块会一下子获得灵性。因此，默默阅读海德格尔不仅在某种程

[1] 应指《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在一位日本人与一位探问者之间》，参见海德格尔文集《通往语言之途》。该对话据说是海德格尔与日本学者手冢富雄之间展开的，时间约在1954年到1954年。对话开始时，双方讨论了海德格尔的日本弟子九鬼周造（1888—1941）对“粹”这个东方概念的研究。不过，后来不少研究者多认为这个对话是虚构的。——译注

度上是成问题的，而且是不自然的。

更深一层的问题还在于，马丁·海德格尔是否真说出了某种实质性的和值得探讨的东西？他关于人与世间（*mundum*）的连篇累牍的宏论是否确有深意，而不是某种同义反复的催眠符咒？从卡尔纳普到今天，分析哲学一向认为《存在与时间》以及海德格尔后来的作品是“纯粹的故弄玄虚”，是充满极端蒙昧和戏剧色彩的“non-sense”（谬论，直译为“无意义”）。但在伽达默尔看来，这种哲学史上的“非功利性思想活动”（指分析哲学）显然是在盎格鲁－美利坚的话语气氛中产生的，它才是非理性主义的可怕例证，才是对逻辑争论活动的催眠性瓦解。这种潮流席卷了黑格尔和尼采身后的德国，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国的感受性世界。在这个背景下，海德格尔的策略是让他的文字保持一种暗夜般的空寂和诗化散文般的极端原始性。在这本关于海德格尔的小册子中，我试图对上述评论的含义和范围给予澄清。我还将尝试着指出造成海德格尔语言困局的那种基础的和发生学意义的根源。现在让我们回到这个假设。

在其马堡大学时期以及更早的弗莱堡大学学习和任教时期^[1]，很多人都想知道海德格尔风格与学说的革命性从何而来。对此他曾宣称：“我是个神学家”。确实，海德格尔受到过很好的神学训练。当初，正

xvi

[1] 1911年到1913年，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学习神学；1916年他获弗莱堡大学讲师资格；1922年，他到马堡大学哲学系担任副教授；1928年他回到弗莱堡大学接替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的哲学讲座教授。——译注